编者按：近年来，官员因抑郁等心理问题引起的自杀事件多次见诸报端。有调查显示，官员心理健康状况值得关注。因对心理困境调适不当，有的领导干部出现身心健康受损、职业效能感下降等问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意愿和能力也随之受到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由中央党校主办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在2016年第3期聚焦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组织系列文章进行了深入探讨。

心理调适：领导干部面临的紧迫问题

□ 本报记者 吕红娟

领导干部面临的心理困扰及危害

大量调研成果表明，当前公务员存在相当比例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职业倦怠、自我效能感低等问题，甚至个别公务员心理严重失调，出现精神崩溃、吸毒、自杀等行为。这些不仅给公务员个人和家庭带来困扰和伤害，而且也不利于公务员忠实有效地履行职责，影响着执政的基础和施政效果。

为什么有的官员“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针对官场存在的“双面人”现象，黑龙江省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副主任赵福生教授剖析了官场“双面人”双重行为背后的“双重心理”。他强调，官场“双面人”是党内最危险的因素。如果这样的“双面人”越多，党员群体内部的思想就会越分裂，干部就会越脱离群众，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会越发降低，就越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恶果和损失。防治官场“双面人”的有害倾向是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作为具有多重社会角色的群体，女性领导干部在发挥自身独特作用的同时，也承受着男性主流社会期待带给她们的种种困惑、内心冲突和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女性领导的成长与发展。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领导研究院副院长张素玲教授指出，很多女性领导成长发展中存在心理障碍。如，自卑意识和依赖心理、成功恐惧心理、刻意模仿男性心理、完美主义心理等，这些心理障碍影响了女性领导健康人格的形成、领导力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阻碍了性别平等与社会发展。

基层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落脚点，基层干部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影响其行政效率和自身发展，也影响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对2015年度参加广西区委党校培训班的乡镇干部和2013级广西区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的科级干部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调研显示，一方面，基层干部表现出锐意进取、自信的积极心理。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焦虑、职业倦怠、失衡心理、孤独寂寞等心理问题。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特殊职业群体，由于受工作岗位、环境、工作性质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领导干部群体面临的压力经常被忽略或少有人研究。针对这一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徐如明老师按照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了宁夏240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发现，宁夏领导干部大都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而工作压力是领导干部压力的主要来源。76.5%的领导干部认为压力来源于工作责任很大；67.2%的领导干部认为压力来源于繁重的工作任务；70.3%的领导干部感觉工作时间紧迫；41.0%的领导干部经常加班。此外，收入和子女教育也是领导干部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四大冲突造成部分领导干部心理困境

领导干部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们遇到的心理冲突较多，这是致使部分领导干部群体陷入心理困境的最主要原因。

国家税务总局党校管理学教研室主任周敏教授和该校心理训练中心副主任李朝波在撰写的《领导干部的心理困境与心理优势》一文中，将这些冲突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既要提升工作显成效，又要承担责任潜风险。在挑起“发展”重担的同时，还要面临“责任”的风险不确定性，责任重大和能力有限的矛盾，使部分领导干部经常陷入极大的心理苦闷。二是既要受规则明约束，又要遵循人情潜规则。有时严格执行制度、按规定办事行不通，但是若能理顺人际关系反而有灵活处理的办法，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把握灵活性、策略性、艺术性去处理问题，尤其需要高度警觉地处理各种微妙关系。为此，他们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协调复杂的人际关系上，这种工作特点让他们劳神费心、心力交瘁。三是既是“社会人”，又是“行政官”。领导干部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复杂，既身处个人庞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又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资源的支配者，在面对“人情请托”时，经常左右为难。四是既需要奉献，又需要实现自我价值。在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下，自我价值的外化象征物都与职务职级直接挂钩。遗憾的是，金字塔的人事结构致使很多领导干部遭遇“天花板效应”的晋升尴尬，职业的公共价值和个人的自我价值这组矛盾经常在领导干部的内心深处碰撞。

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苏曼丽和陶建平所做的调查分析显示：基层干部出现心理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其中87.52%的调查者认为自身心理问题主要来自“工作压力”，69.41%的调查者认为主要来自“体制机制”，选择“经济压力”作为主要原因的占45.63%，有34.18%的人选择了“亲情关怀”，还有22.74%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个体素质”。徐如明对宁夏领导干部的抽样分析表明， 宁夏领导干部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本身因素、收入、生活压力方面，具体体现在工作责任、工资福利、子女教育三个方面。

领导干部如何走出心理困境

结合领导干部工作中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大多数学者提出从个体、组织以及社会三个层面来帮助领导干部走出心理困境。此外，也有学者从体制层面和教育培训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胡月星教授指出，领导干部不仅要具有不畏艰难、顽强奋斗的意志品质，更需要情绪稳定、乐观向上的心理状态，其中保持和拥有健康积极心态至关重要。积极心态包括：责任担当心、感恩快乐心、组织忠诚心、利他关爱心、积极进取心、敬畏自律心、自尊自信心。

心理困境本身不是问题，正确认知和有效调适心理困境才是问题的关键。周敏、李朝波认为，领导干部要对心理困境有积极的认知。此外，领导干部具有较强的心理韧性和心理复原力，要学会聚焦优势资源，提升个人的心理调节能力。

女性领导如何进行自我心理调适？张素玲教授建议从五个方面努力：一是强化对自身身份角色的认知。二是树立自信心。三是学会以坚强乐观的心态面对有时不可避免的角色冲突，懂得通过多种方式释放心理压力，积极与家人沟通以得到其支持。四是不断学习，加强自身修养，不仅要保留自己的性别特征，而且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性别优势。五是学习用幽默的方式、用努力和富有成效的工作、用依赖于外部的支持系统来处理疏离感。

自我调适的前提是注重理论学习。苏曼丽、陶建平认为，基层干部要坚持理论学习，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头脑，用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取代负面的、消极颓废的思想影响。要学会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知识，学会用自我调适的方法来改善心理健康水平。此外，基层干部要将目标追求合理化，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妄自菲薄，实事求是地评价自我。

面对领导干部存在的心理困境，组织帮助是核心。苏曼丽、陶建平建议，组织部门要坚持干部谈心制度，丰富基层工作内容，缓解基层干部因工作单一、枯燥而引起工作倦怠。

从干部管理的角度而言，各级单位要对领导干部的心理困境给以足够的重视。周敏、李朝波强调，应通过探索将心理服务项目纳入干部管理体系，为领导干部提供心理支持，帮助领导干部提升心理优势体验。

对于女性领导干部成长中面临的心理困扰，张素玲教授认为，组织部门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女性领导的历练，比如把女性领导特别是年轻女性领导放到艰苦环境中去，放到基层重要岗位上去，让她们经受锻炼和考验。要拓宽渠道，加大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女干部交流的力度，使女性领导拥有丰富的、多方位的视野和经验，这样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抗压能力，危机处置能力，才会不断激发她追求领导岗位、承担责任的动机以及过硬的心理品格，成为能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领导。

宁夏自治区党校徐如明老师则建议，组织层面要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进一步明晰岗位的职责，改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减轻工作强度；进一步完善奖惩制度，完善轮岗、调岗制度，建立科学的职业发展渠道；进一步完善薪酬管理指标体系，逐步提高公务员待遇。

鉴于领导干部的心理困境经常是在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过程中诱发，可以从营造支持性的履职环境入手，提升领导干部的心理优势体验。周敏、李朝波认为，建立开放、透明、信任的相互关系，营造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在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发生巨大转变的背景下，应该从组织要求层面以及群众期待层面都加强引导，给领导干部留有时间和空间适应这个变化，为领导干部建立新的“心理舒适区”留有必要的缓冲。

张素玲教授认为，应通过社会文化教育和媒体舆论等转变传统的性别文化观念，形成有利于女性发展的社会文化舆论环境。

多位学者都提出，要重视亲情的作用，积极寻求家庭支持也是缓解领导干部心理压力的重要方面。

此外，苏曼丽、陶建平强调，基层干部要走出心理困境，体制完善是根本。要建立差异化的目标下达机制，防止“一刀切”现象，实现政策目标与当地实际相符。在定编定岗时考虑该岗位的实际工作内容，对于任务重、难度大的岗位应适当增加编制，缓解由于人手不足带来的压力。适当下放基层权力。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有详细的工作制度和严格的落实机制，减少工作的临时性和突发性，减少紧张焦虑感。赋予基层责任的同时，在确保监督到位的情况下，适当下放权力，为基层工作开拓空间，实现权责对等，提高工作积极性。完善考核晋升体制，切实解决基层干部困难，使他们能全心全意投入基层工作，无后顾之忧。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所做的调查中，85.92%的基层干部都认为心理健康很重要，同时大都表示目前尚缺乏充足和有效的心理健康培训。如何切实增强公务员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促进公务员心理健康成长？大连市委党校副教授韩阳和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孙立樵提出，公务员心理健康教育应秉承积极心理学理念，侧重于以发展为主导的教育培训模式，教育方法应该多元化，除了传统的讲授式之外，还应借鉴不同心理咨询与治疗流派的成熟技术，加以吸收改良，逐步形成符合公务员心理发展规律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心理教育还应注重与其他学科优势互补，做到教育培训内容和方法的完美结合。

心理健康应成为选任干部的重要标准

心理健康是制定和实施正确领导决策的必要条件。中纪委研究室研究员邵景均认为，容许有心理疾患的人走上或留任重要领导岗位，就有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不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工作角度考虑，都不应该把那些具有严重心理疾患的人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对于那些已经表现出严重心理疾患的领导干部，应尽快将其撤离领导岗位。

邵景均研究员总结了九种严重的心理疾患，即嫉妒心理、报复心理、偏执心理、自恋心理、依赖心理、冷漠心理、奉承心理、物质依赖心理、说谎癖等。他认为，患有这几种心理疾病的人是不能委以领导重任的。他还强调，从干部工作来讲，仅仅停留在基本标准层面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一系列具体标准和要求，如知识化、专业化等。而其中，就应该引入现代领导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把心理健康作为选任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重要标准，这是干部标准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

在选任领导干部时必须考虑心理健康与否这一因素。广西自治区党校苏曼丽、陶建平两位学者也认为，在选任干部时，为保证选拔方式的科学性，应引入先进的人才选拔理念，融入心理测评等手段，通过专业的测评和鉴定，将身体素质、能力素质和心理素质都纳入考察范围。在干部招录任用上应增加心理测评环节，将本身存在心理疾病而不能胜任基层工作的人员及时甄别出来。

观点综述

有感而发

城乡二元结构该打破还是维持

——与贺雪峰教授商榷

编者按：4月7日，《学习时报》社会治理版刊登了贺雪峰教授的《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一文。文章认为，正是因为土地在农民手上，农民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获得了在城乡之间进退往返的自由空间，从而保持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 王 晓

贺教授的弹性理论，是从城乡基础养老金的比对切入的。在贺教授看来，农村中凡年满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能领取到基础养老金，比儿子给的养老费还多。有自然是好，即使没有也无所谓，因为农民手上有土地，完全可以不需要子女赡养而做到自给自足，就算是到了不能种地的年龄，还可以种菜、养猪、养鸡，从事力所能及的副业。但城市老人却不行，如果他们拿和农村老人一样的基础养老金，会因为没有可以劳动的土地作为后援支持而无法生存。可以看出，贺教授之所以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富有弹性，是因为农民手中有土地，干得动可以种田，干不动可以搞一些副业。正是缘于此，在养老保障问题上，贺教授主张要城乡有别，差异对待。如果真如贺教授所言，那么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城市老年人可以拿着高出农村老人不少的养老保障金颐养天年，而农村老年人却还要下地上田？难道就因为他们手上有土地吗？果真如此的话，土地对农民而言真的不是什么生活保障，而实打实地成了累赘。由此不难看出，贺教授所谓的土地弹性不过是站在城里人的角度上得出的罢了。况且，在年轻一代大量外出务工、适龄儿童留守家中、医疗保障尚不健全的农村现阶段，你何以指望区区几十元基础养老金就能够持平城市老人的生活质量？

为支持其观点，贺教授接着指出，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并不限制农民进城，农民能否进城和在城市安居主要不再是制度问题，而是他们能否在市场经济中寻找机会的问题。但问题的实质恰恰是，机会对于城乡居民而言并非是公平公正的概率事件，其根源仍要追溯到制度建构上去。乡下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劣势地位，不但是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结果，也是当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仍无太大改进的现实表现。所以要想真正实现机会均等，城乡一体仍是重中之重。

但需要说明的是，城乡一体并非只是简简单单的农民进城，而是城乡之间持续不断的双向互动，农村的资源（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源）不但可以进城，而且城里的资源亦可以自由下乡。然而遗憾的是，贺教授却反对此说。他主张固化现阶段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资本下乡，比如城市人不能到农村买农民的房子。贺教授之所以这么认为，出发点自然是好的。因为在他看来，当前农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是他们的生存底线，故不能够用以交易。他例证说，城市人到农村买房子，是因为要为过剩资本找到储值手段，或要在农村多一个休闲去处，而对农民来讲，一旦他们失去农村住房，他们进城失败就再不能返乡，他们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

对于贺教授的这一观点，我想从实际经验和抽象理论两个层面提出不同的看法。我出身华北农村，依据我的个人经验，资本下乡在现阶段是大受农民欢迎的，至少在我的家乡确实如此。如果有机会到当下的农村走一走，你会发现农村的房屋早已不是鳞次栉比的合理安排，而是东一家、西一家，很多宅基地早已杂草丛生，无人居住。关于宅基地买卖问题，我特意咨询过村中老人，他们确实承认过去村民对宅基地看得很重，“即使要饭也要有立棍的地方”，但又普遍表示近些年计划生育导致少子化，加之农民工进城留居城市，很多宅基地就此废弃，村民多愿意拿出来卖。所以，资本要不要下乡或者适合不适合下乡，不能由别人替农民做主，而要听从农民自己的心声。自步入近代社会以来，我国的农村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巨变，而作为农村的主体存在，农民自然最为敏感。他们的需求多是从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比浮光掠影般的社会调查要来得真切和深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可以推广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而确定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甚至还可以参照广西宜州市合寨村村民所自发成立的村委会而实施全国基层村民自治（事实也证明这些决定都是有效的），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非要抑制现阶段的农民主动走上市场化的需求呢？再者，从理论上说，贺教授完全把农民想象成了会被市场经济随意摆弄的木偶，而完全忽略了中国农民的理性特质。这难免悲观了些。试想，有多少农民会在城市生活尚未稳定下来之前就卖房卖地的？如果我们试着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农民自有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理性和行为逻辑。据父辈们讲述，在宅基地被珍视的年代，为了避免后代中出现的不务正业者随意典卖宅基地，在兄弟分家时会故意把宅基地进行不均匀分配。如此，每个兄弟得到的都不是方方正正的宅基地。但正是因为不均匀，所以“不成宅”，也就不容易拿去买卖。这是地方性知识，也更是农民的理性。贺教授的代表作《新乡土中国》我认真拜读过，里面多次把农民看成是精于算计的，缘何在此却又低估农民的理性呢？

以问题导向寻找“精准扶贫”突破点

——“经济新常态下扶贫产业政策及实践论坛”综述

□ 程冠军 郭丽娟

4月24日，“经济新常态下扶贫产业政策及实践论坛”在中央党校育园楼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央党校报刊社、理论网、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中央党校、国务院扶贫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中央党校进修部、培训部学员代表，西藏班学员代表，金融机构和企业家代表100余人参加了论坛。

首先大家对精准扶贫的精准定位问题发表了看法，与会专家指出，扶谁的贫、谁来扶贫、怎么扶贫，是精准扶贫中必须予以重视的三个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管等方式方法，对扶贫对象精准定位；通过政府引导，调动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怎么扶贫就是要解决好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在这方面要重视外部输血向自身造血功能的转变，要从制度设计上解决好资源分散、“九龙治贫”的问题，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针对边疆地区的扶贫问题，参加论坛的学员代表认为，边疆地区的精准扶贫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关键环节，要重点突出基础设施，把水利、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摆在优先位置，加快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突出产业就业，以贫困群众增收为核心，因地制宜发展各种产业，增加就业岗位，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有活干、能挣钱、早脱贫；突出公共服务，加快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突出组织建设，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选派思想好、能力强、作风正、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

对于西部地区的扶贫问题，县委书记班学员代表在发言中举例说，习近平总书记曾重温老一代革命家习仲勋1985年对毕节扶贫的批示，并指出，毕节曾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那里的发展变化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如今，恒大集团已经计划对毕节地区的大方县三年内投入扶贫资金30亿元，通过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吸纳就业扶贫、发展教育扶贫和特殊困难群体生活保障扶贫等一揽子综合措施，到2018年底实现大方县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在农业生产结构问题上，参加论坛的企业家代表认为，建设高效环保、综合设施配套的农业循环产业链是农业革命的必由之路。几十年来，农业生产结构从传统分散农业发展为集约化、规模化生产，这个改变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农业生产结构上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改变入手，在现有结构内，根据国家现有政策，鼓励和引导现有企业通过土地流转，逐渐向现代化循环农业方向发展，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特色农业。

关于政策性金融扶贫问题，农发行项目负责人介绍，2015年6月，农发行在全国金融系统率先成立了扶贫金融事业部，按照“政策支撑、专项管理、单独核算、保本经营、服务和社会效益良好”的原则，全面加强政策性金融扶贫工作，这在我国金融扶贫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政策性金融脱贫提供了新思路，政策性金融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关键支撑，必须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不断提高政策性金融扶贫的质量和效果。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本次论坛以问题为导向，跨界融合、精准发力，发言没有套话空话，会风务实高效，找准了扶贫的问题点、症结点、突破点，实现了产业、金融、互联网、政府、企业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精准对接，使中央政策一直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中央党校学员代表对论坛表现出极大兴趣，希望以后要经常开展这样的论坛，为精准扶贫提供智力支持。

中央党校报刊社总编辑钟国兴、中国扶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宏超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钟国兴总编辑和中央党校报刊社副总编辑杨英杰分别主持论坛。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夏涛，中央党校第58期西藏班学员汤大锋，贵州省大方县委书记张瀚时，欣禾农业公司董事长侯三群，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郝全洪、正局级组织员牛卫国、副局级组织员王迎雪，培训部西藏班班主任张伟等参加论坛。论坛嘉宾、西藏班学员及企业家代表还围绕扶贫产业开发相关热点话题进行了对话交流。